



# 目录 CONTENTS

汪维藩	怀念罗竹风先生	3
Wang Weifan	Memories of Mr. Luo Zhufeng	
李栋	正视基督教活动场所设立中的“棘手”问题	14
Li Dong	Facing Squarely the Thorny Issues in Setting up Christian Meeting Places	
顾梦飞	H省基督教异端暨邪教活动调查分析	24
Gu Mengfei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Christian Heresies and Cults in H Province	
陈丰盛	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发展与自立运动的尝试 ——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简史(1878-1958)	35
Chen Fengshe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Methodist Perish in Wenzhou (1878-1958)	
张忠成	从温州教会的牧区现象看教会的牧养管理	53
Zhang Zhongcheng	Ministry and Its Management: the Phenomenon of "Ministry Districts" in Wenzhou Church	
翁翠琴	教会团契的建立及其“群分”的逻辑与实践	86
Weng Cuiqin	Establishing Community in the Church and the Logic behind and Practice of Setting up Fellowship Groups	
汤士文	他救与自救 ——基督教的人性论和救赎论与儒家文化的人性论和道德修养论之对比	101
Tang Shiwen	A Comparison of Salvation through Faith in Christ and Self-justification	
苏志明	崇拜的神学初探	121
Su Zhiming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Theology of Worship	
陈喜瑞	加尔文圣灵论初探(3)	148
Chen Xirui	On Calvin's Pneumatology (continued)	
苌威威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175
Chang Weiwei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John Leidon Stuart and Yenching University	
[瑞士]克里斯托弗·司徒博	不向穷人取利:加尔文的经济和银行业伦理	200 ~ 217
Christoph Stuckelberger	No Interest from the Poor: Calvin's Economic and Banking Ethics	

## 不向穷人取利：加尔文的经济和银行业伦理

[瑞士]克里斯托弗·司徒博<sup>①</sup>

### 1. 加尔文神学中信心和行为的关系

伦理学是对下列问题的回答：我必须做什么？我如何、我们如何一起负责任地行动？从神学角度看，责任通向信仰的核心，而负责任地行动乃信仰的果子。今天我将着手研究的加尔文的经济和商业伦理，只能在信心和行为间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基础上才可被理解。

“责任”一词指向我们主旨的核心。“负责任的”语义上简明地意味着去“作出回应”，去“给予回答”，因而已经指明了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之路：责任，Verantwortung, responsabilité(法语)源自拉丁文 *respondere*, 回答, Antwort. *Re-spondere* 包含 *spondere*一词：交托自己, 应允, 奉献(襄助)。上帝献上他的创造和他自己, 信守他同人类的圣约。*Respondere* 指的是以信心和行为去回应上帝的这种作为。

故此，“有信仰”指的是接纳上帝的赐予并以信仰的行动和伦理的

<sup>①</sup> 本文作者系环球伦理网(Globethics.net.)创建人、前主席,2008年起任环球伦理网执行主任、瑞士巴塞尔大学伦理学合作教授等教职和研究职务,改革宗牧师,有多部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等方面的著作。

行为去回应。

正如在这个专题文章系列丛书框架中业已惯常强调的,加尔文的生活和神学的的确打上了他作为难民和寄居者这种状况的烙印。<sup>②</sup> 在人类生存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教会的变易中,对加尔文而言,上帝丰盛的赐福特别存在于他神圣眷顾的应许之中。他在其代表性巨著《基督教要义》中写道,上帝是恒久地主动的,不仅仅在乎创造的大功,而且在乎“对这项事工的保守和引领”;不仅仅在通常意义上,而且上帝“以特别的神圣眷顾去保守、滋养和呵护他所造的每一个个体,下至最小的麻雀。”<sup>③</sup> 对加尔文而言,人类天生的责任起因于上帝神圣的眷顾:“因为他对我们的生命加以限定,同时把对生命的呵护交托给我们,给予我们理解力和方法去维系它。”<sup>④</sup> 对加尔文来说,伦理学上发自信心的行动意味着负责任地运用交托给我们的财富,比如智力、物质的货品、发明创造、研究探索,等等。纵然“荣耀应该独归上帝”——加尔文神学的概要——并且人类自身不能行善,但上帝通过圣灵赐予他们一种非常重大的行动和责任的可能性。依加尔文看来,上帝通过信者和不信者双方来做工。因而在加尔文那里,人论的两方面都是清清楚楚的:因着原罪,人类是完全败坏的,且无能为力(正如Reinhold Bernhardt在其论文中略述的);但加尔文的人论也有另一方面:作为在基督里的新创造,人得福于无数恩赐。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对创造的恩赐

<sup>②</sup> 例如,比较Ulrich Gabler在这次轮回讲座中的论稿。

<sup>③</sup> *Institutes I*, 16,1. (英文标准版本乃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1960.) Cf. also Fuchs, Erich, "Calvins Ethik", in Hirzel, Martin Ernst/Sallmann, Martin (eds.): 1509-Johannes Calvin-2009. Sein Wirken in Kirche und Gesellschaft. Essays zum 500. Geburtstag,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08, 183-199, esp. 183-185.

<sup>④</sup> *Institutes I*, 17,4.

和感召力十分积极的态度，在加尔文对未来的开放性和定位上具有重大的影响。

《基督宗教训导》的第三卷冠以“我们以何种方式分享在基督里的恩惠，这种恩惠从中为我们结出何种善果，从中生发何种功效”。加尔文用超过350页展示了在上帝恩惠中这种分享“通过圣灵隐秘的事工来祝福我们。”<sup>⑤</sup>故此，对加尔文来说，伦理植根于圣灵论并具有一种末世论的倾向。因而伦理的行动对信仰而言具有全新的意义：唯独靠着信心的称义从一种对藉由劳动成果称义之救恩的挂虑中释放了我们，也就是说对靠着善工称义之救恩的挂虑。更进一步地说，称义带来自由。我们蒙上帝所爱、所扶持，而凭我们的行为我们无善可陈。显然，我们正在靠这种方式变得能够去爱并且能够合乎伦理地行动：“脱离律法之辖制的自由首先令我们能以欢跃地顺服。”<sup>⑥</sup>

## 2. 出于自由，凭着克制，靠着对上帝的信赖行动

加尔文的伦理学说在方法论和教义上被四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刻上印记：他对上帝的信赖，他对福音中的自由的理解，由此得出的对律法的理解，以及他的圣经诠释方法。

信赖上帝居于加尔文神学的中心。对他来说神圣的眷顾不是一种抽象的教义架构，而是生发盼望的教牧灵命激励。同样地，预定论教义之嚆矢彻头彻尾与对灵魂的眷顾有关，也就是我们不必去挂虑的我们灵魂救恩的确定性，但我们却能将我们自己完全委身于我们的邻舍和对世界的服务。

<sup>⑤</sup> *Institutes*, III, 1, title.

<sup>⑥</sup> *Institutes*, III, 19,15.

在信心中增长的自由使我们从律法的压制下得释放，我们能自如地运用上帝的恩赐。但这不是“荒宴和浪费”、“软弱的过犯”<sup>⑦</sup>、横行霸道、散漫放荡或混乱的自由通行证。进一步地说，这种自由因着一种中庸适度、趋向正义的生命释放了我们。饮用美酒，但不至于烂醉之地，因为此举会重创情谊；享受安逸，但同时也能忍受贫困，并因而也无物质依赖之忧。因此，加尔文离清教徒主义甚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他来说，在过分丰富与过分贫乏之间恰当的平衡，那当然是适度中庸，此种适度和中庸起到伦理指导方针的作用，此方针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其伦理告白。清教徒并没有达到这种平衡。

难道这种自由令圣经的律法变得多余吗？加尔文回答：不是。律法具备一种三个层面的含义：“律法的第一项功用(*usus elenchticus*)在乎它向我们昭示上帝的义这个事实；即在上帝面前何事蒙悦纳，并依照此种方式针对他们的不义警示每个个体。”<sup>⑧</sup>它像一面镜子向我们展示我们的败坏，所以我们自由的荣耀只能归给上帝。律法的第二项功用(*usus politicus*)是政治的秩序，这种秩序像一副“马嚼”或缰绳促成潜在的友谊和在社会中共同生活，并“阻止每一件事陷入可怕的困境；因为倘若每个人都可为所欲为，这就是将会发生之事。”<sup>⑨</sup>这种说法好比它是在宣扬完全内在的属世意义，而不是神圣的意义，但正如慈温利要说的，这至少是“属世的公义”。第三项，律法最重要的功用(*usus in renatis*)在于赐给信徒在顺服中对生命的指导方针，一种鞭策，一种在他们的自我行动中不迷失对上帝国的洞见的激励。它如铅封一般巩固了与上帝之约。<sup>⑩</sup>

<sup>⑦</sup> *Institutes*, III, 19,9 and 10.

<sup>⑧</sup> *Institutes*, II, 7,6-9.

<sup>⑨</sup> *Institutes*, II, 7,10-11.

<sup>⑩</sup> *Institutes*, II, 7,12-17.

这于是引向加尔文神学中的圣经诠释方法——我参阅了在此领域的 Ekkehard Stegemann 的讲稿——这种解经方法极其严谨地对待圣圣经经文,包括关乎律法的经文,而且按照福音书中的自由,基督里的救赎,以及对律法的三重理解去调配和解释经文。

### 3. 信赖上帝,而不是贪恋和信赖金钱

对我而言,加尔文的伦理学在其教义中的布局是重要的,因为依循这条途径,可以展示出他的商业伦理并非机会主义式地生发自当代精神或经济考量,而是具有深厚的神学根基。寄望于交托给上帝的信心的镇静,对商业伦理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正如出自加尔文讲章的下列引证所显示的,它听上去很合乎题旨:“人如此怀疑和惧怕世界将不会给予他们应得之物。因此上帝说……‘我使你兴盛。如果你行这事,我的赐福和恩惠将使你子孙繁盛。’毋庸置疑,上帝在此想要纠正这种对信仰的缺乏……在这种缺乏中每个人都在设想他没得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为自己攫取每一件事物的原因。他们试图牢牢地抓住它。他们永无满足。他们拥有越多,他们的欲望就越炽烈,就像一个即便业已烂醉仍嗜酒如命的醉汉一样。”<sup>⑪</sup>

1556年2月11日,正值一个严峻紧张和剧变的时刻,加尔文这位日内瓦的改教者在关于《申命记》24:19-22的讲道中表达了对贪欲的这种批评和他对上帝赐福的信靠。在2009年,这也是正中话题,2009年是一个为工作担忧的年份,一个面临调整而为陷入危机的有价证券担忧

<sup>⑪</sup> Published in German for the first time in Jehle, Frank, *Du darfst kein riesiges Maul sein. Freiburger Vorlesungen über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Reformatoren Luther, Zwingli und Calvin*, Basel: Gotthelf Verlag, 1996, 93.

的年份,这种调整是商业和环境危机所必需的。我对这条途径留下印象,借着这条途径,加尔文成功地将他对上帝神圣眷顾和关怀的深刻信赖转化成一个易懂的、理性的、朝向未来的伦理和社会全景。(附带地说,应该注意到,“不是金钱而唯有上帝能提供希望和安全”的警语镌刻于多种多样的硬币上:在瑞士,我们钱包里随身携带的硬币上有“dominus providebit”,“上主必预备”,刻在瑞士五法郎的硬币上,此警句取自伯恩的 *Ancien Régime* 硬币。从1864年,“我们坚信上帝”就已经印在一美元的纸币上;在最近的几个月,华尔街的某些银行家也许已经拿新的眼光来读这个警句)。

现在,我将用应有的简洁来论证加尔文的商业和经济伦理,特别是在四个范围:他关乎利息的教义(“银行业伦理”);他对财富的理解;他的工作伦理和对科学的态度。在其《基督教要义》中,特别是在他无数的讲章中,尤其是论《申命记》的讲章中,加尔文记述了这些观点。<sup>⑫</sup>因此,我们需要简要地看看加尔文时代的欧洲特别是日内瓦的经济发展状况。

### 4. 日内瓦和经济的“环球主义”

特别是十五世纪末以降,欧洲经历了空前的经济增长额度。遭受瘟疫致死两千五百万,继之以农业危机和饥荒的时代现在逐步好转: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产生无限的精神和科学的动力。1543年,加尔文的同时代人哥白尼出版了他的天文学研究巨著,这后来被称为哥白尼

<sup>⑫</sup> What in my opin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n Calvin's business ethics in recent times remains the standard work by the late Lausanne ethicist and economist Biéler, André, *La pensé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Calvin*, Geneva: Georg, 1961, new edition 2009; English first edition: *Calvin's Economic and Social Thought*, Geneva: WCC publications, 2005.

天体运行说。就在加尔文诞生前17年,哥伦布完成了对美洲的发现;1499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到达印度;1505年,来自蒂罗尔(Tyrol,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西部接壤的阿尔卑斯山东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的Balthasar Springer带着葡萄牙王的特许证件航行至印度以及其他地方,开通了同印度和通向欧洲的日用品港口的经济贸易。贸易和银行业在商业运作中扮演中心角色。

我将以Fuggers家族作为这种全面发展的一个例证,“第一个资本家Jakob Fugger何以发现全球化”一语位居《国家地理杂志》2009年3月刊的标题页。从1494年,由Jakob Fugger起,<sup>⑭</sup> Fugger家族商行连同其在奥格斯堡的总部就成为一个我们今天所谓之环球操控者。它的贸易关系网纵横交叉于整个欧洲(日内瓦是威尼斯和伦敦之间的接合点,居于德国、里昂和西班牙之间);他们担负着同印度和南美的贸易。三个商业层面位居中心:尤其是来自欧洲中北部的纺织产品和贸易及其工厂;特别来自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采矿业(金、银、铜、铁)贸易;加上现代银行系统的建设。在十六世纪,同教廷(教皇利奥十世是梅蒂奇家族成员)关系紧密的佛罗伦萨的银行业巨擘梅蒂奇家族(the de Medicis)的领军角色被Fugger家族的银行业所取代,这个家族属天主教,并且与教皇同样密切(1846年,奥格斯堡议会第一次称Fugger商行为银行)。同土地和工作一样,流动资金(资本)在十六世纪也是生产的一个首要因素。Fugger商行筹划了来自宗教特赦的资金向罗马的周转,以及僧侣圣俸的周转,借着这种周转,红衣主教、主教和修道士购买从教皇而来的那些高级圣职的任命状(今天,这种情况被称作选举腐败,正如选票是用金钱买的)。尽管有官方的天主教对高利贷的禁令,Fugger商行还是

<sup>⑭</sup> Häberlin, Mark, *Die Fugger. Geschichte einer Augsburger Familie (1367-1650)*, Stuttgart: Kohlhammer, 2006.

是囤积了相当可观的银行税费和资金流通中的获利如利息等。他们遭到路德的抨击,路德发牢骚道:“Fugger家族以及诸如此类的公司确实必须被坚决禁止。”<sup>⑮</sup>在这之后,纽伦堡德意志帝国国会对达到5000荷兰盾的贸易公司的资金进行限制,并禁止国外投资。Fugger家族因垄断交易遭到指控。他们悲叹,这是大商号的末日。在那个时代,贪婪和滥用已经引发了国家的调控干预。今天,Jakob Fugger会被称作一个寡头执政者和亿万富翁。作为创始人和赞助者,他也资助社会和文化机构。到1525年他死的时候,他留给子孙的遗产按今天计量总数在40亿到70亿瑞士法郎之间。

## 5. 加尔文关于高利贷的差别伦理学

与这种背景相对,变得更加清晰的是,加尔文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家(马克斯·韦伯从未主张这一点。稍后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进一步说,加尔文生活在一个货币经济泛滥的时代,但也是一个为更深的经济扩张和国际贸易而对金钱有显著的、外加的需求的时代。一方面,因其官方的基于旧约对高利贷的禁令的顽固立场,另一方面,因其无数丑闻和双重道德规范的困局,天主教会不被信任,因此,收取利息在官方是被禁止的,但实际上被容忍且被梵蒂冈用以自肥。梅兰希顿已经赞成实计利息。加尔文对高利贷的态度,可从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文本的范例中得到论证,也就是他给一位银行家的信。

1545年11月7日,银行家Claude de Sachinus写信给加尔文,他将加尔文描述为一位在信仰上的弟兄(frère),并问加尔文对收取利息的意

<sup>⑮</sup> Quoted from Brunner, Erwin, *Jakob der Reiche. Wie vor 500 Jahren ein Kaufmann aus Augsburg die Globalisierung erfand*, National Geographic, German edition, March 2009, 27-51 (51).

见。他说,同时代的人作如是观:收取利息,鉴于这是诚实的,正当的(*"une sorte d'usure honnête"*)和适中的(正当的比例),作为基督徒也可以提倡。但对他而言,面对宗教改革,他是心怀感激,唯有圣经是判断的标准,即使圣经与他的商业利益背道而驰。<sup>⑯</sup>这里是一个有力的见证,一位在市场中的基督徒银行家寻求福音书的指导方针!

对加尔文来说,加尔文以知识分子伟大的诚实去正确地对待圣经经文,圣经在旧约宣称对高利贷的禁绝,他还寻求依照所提及的上帝正义的关怀、基督徒的自由和律法的三重功用的标准来解释经文。他在一封很长的信中论述了这个问题,这封信很可能是寄给这位银行家的。<sup>⑰</sup>

在信中,加尔文描述了旧约对高利贷的禁绝的意义在于如何帮助穷人,对穷人来说,支付利息可能是对他们生存的一种威胁。鉴于利息的征收经常被滥用,实际上他宁愿完全禁止利息的收取,而且他担心如果他肯定地论及高利贷,人们就会比他所正确地估量的更多地容许他们自己进行实际操作。然而带利息的资金也能服务公益(*"utilité commune"*)。这样,我们就意识到加尔文在正确地对待圣经的答案上

<sup>⑯</sup> "L'autorité des Saintes Ecritures a trop de valeur pour moi, pour que je me laisse détourner d'elle (même si elle affirme le contraire) par les préjugés des hommes, aussi savants soient-ils" ("The authority of the Holy Scriptures has too much value for me that I should allow myself to be turned from it (even if it affirms the contrary) by the prejudices of men, however learned they may be": *the letter of C. de Sachin to J. Calvin*, Calvinus Opera vol 12, cols 210-11, Extract from Cod Genev.109, fol 14, quoted from Dommen, Edouard, "*Calvin et le prêt à intérêt*", in *Finance & bien commun/common good*, No 16, Autumn 2003, pp.42-58 (44).

<sup>⑰</sup> "Jean Calvin à l'un de ses amis", *Calvini Opera Omnia*, tome 10, pp.245-49, quoted from Dommen, Edouard, "*Calvin et le prêt à intérêt*" (n.14), pp.54-7. Cf. also Biéler, André, *Pensé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FN 11), pp.456-461. Amazingly the letter was first published only in 1565, twenty years after it was written!

的挣扎。在此,指导方针不能是单一处的圣经章节;它必须属乎上帝的圣灵和“公平的尺度”(*"règle d'équité"*)。最后,他谨慎地支持“*quelques usures*”——贷款生息的某种适度,但立即补充道:“如果某人试图把靠贷款获利作为一种职业,我绝不会支持。此外我不会向不敬重确定的准则的任何事让步。”他提示了七种此类的“例外”(限制性的规则,特别的形态,特例),这些特例必须明确遵守。我现在要个别地着眼于这些例子,因为它们提供了加尔文对高利贷和银行业的伦理,并可在今天被描述为“公平的政令和利率”的标准。

#### 对收取利息的七条规则(特例):<sup>⑱</sup>

“第一条(特例)是,不可以对穷人实计利息;如果一个人突临危难或造灾祸,他将不会被要求去付利息。”

贫穷的人也因他们的小买卖或去做生意而需要资金,但他们得到的资金必须作为无息贷款。故此不可向穷人取利。资金的偿还是必需的,但在极度贫困的案例中无需利息,因为即便资金的偿还在那时候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能从贫弱者那里获取利润。

“第二条规则是,放贷者不可过分考虑利润,以至于他结果忽视了自己必要的责任,或者因为他想要保守自己的资金安全,而轻视了他的贫穷的弟兄。”

责任意味着对穷人仁慈的行为、为穷人奉献金钱à fonds perdu. 又比如投资赚钱,须为施舍留出足够的金额。再者,依据是贫富间的鸿沟得以缩减。这也是反对贪欲的利剑。加尔文在《以西结书》18章的注释

<sup>⑱</sup> Cf. also Stückelberger, Christoph, *Global Trade Ethics. An Overview*, Geneva 2003, pp.170-171; also Gerechter Preis, Institute for Social Ethics FSPC, Berne 1990, pp. 74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exceptions" here is new and much closer to the French original text than the translation in the English edition of André Biélers book (FN 11).

中说：“一个人不可以随时、随地、随事并从整个世界攫取(利益)。”<sup>⑩</sup>

“第三个尺度是(关于借贷以收取利息)任何事情不可以妨碍与天生正义相和谐之事，而且一个人查验基督的律令所定的限度，比如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等等，这个人将发现他们通常是事出有因的。”

在这里，天生的正义是互惠的黄金率。这是指 *usus politicus legis*—在关乎人类社会的人间正义意义上律法的合理与必要的功用。

“第四个尺度是，一个借钱的人也须从被借出的钱得到等值或更多的益处(与债权人相比较而言)。”

债务人能够有成效地靠着借到的资金所得至少必须产生与付给债权人的利息相若的利润。再者，黄金率已经宣告了为着邻舍的良好生存状态的方针，而且还有更多的涵义。这里变得更加明白的是，加尔文仅从贷款的产出物的角度认可利息的征收。他反对消费贷款。

“第五条，我们不必或者凭一般的或惯用的(涉及利息的)方法去判断何事可行，也不必借俗世的不公义去衡量何事公义且确当，而是依照上帝的话语采取行动。”

历史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或者机会主义式的标准不能作为实行利息的指导方针，而只有符合上帝旨意和为上帝荣耀尽忠之事才能作为标准。回溯至保罗，宗教改革涉及人必须顺服上帝胜过顺服人，此点在这里得到反映。

“第六条是，我们不仅仅重视同我们有交往的人的个人利益，而且要重视对公众有益之事。因为相当明确的是，商业所支付的利息代表了一种对公众的贡献(公共养老金)。故此一个人必须关注合约有利于

<sup>⑩</sup> Dommen, Edouard, "Calvin et le prêt à intérêt" (FN 14), p.47.

大众利益，而非有损于大众利益。”

一种贸易和资金关系不仅仅涉及到合约的双方，而且也对广大的社会有影响(经济的外部特征，宏观经济的果效)。现今的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使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这里加尔文关乎公益的倾向愈发清晰，因为这塑造了他所有的伦理规范。不管对个体和人本主义的强调如何，加尔文全部的伦理观点都是朝向社会的。个体的行为必须考虑其对全体的影响。

“第七条是，一个人不能超越行政区或地方法律的尺度，虽然那通常不是充足的，因为它们通常会承认它们依照某个法律所不能改变或限制之事。故此一个人必须给予新的公平以优先权，这种新的公平的优先权消除了那些变得太过分之事。”

这里所涉及的是公共秩序，它是必须遵守的，但按照加尔文的第五条规则，公共秩序从属于上帝的话语并必然在上帝话语的光照中受到批评性的质问。也不会有不道德的银行业借口指出法律所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而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不，法律只能规范最小限度。有良心的债权人必须——基于美善的宗教改革风尚——超越那种限度。在这里，加尔文声明了律法的第三种功用(*the tertius usus legis*)，对信徒来说，律法是作为一种指导方针和激励。为了诸般公平的缘故，某种对利润的限制，比如凭自愿制约(要适中!)的利润限度以及资本税，也许是必要的。

## 6. 财富和工作伦理：为着公益

加尔文关乎商业和利息的伦理的一个重要根基，是他对财富的态度。象其他改教家一样，加尔文拒绝对职业的优劣等次之分，而当时在天主教教义中这种等级之分是惯例，按照这种等级划分，属灵的等级以

及包含于其中的不拥有私人财产、对物品共享的僧侣等级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等级,这个等级与俗世性财富相匹配。<sup>⑯</sup>加尔文关于财富的教义又一次直接植根于他的神学。

上帝是财富唯一的掌控者。上帝所有的造物属乎上帝。上帝的神圣眷顾的意思是上帝将人类生命所需之物置于他们的管理之下。相应地,人类就像上帝的管家一样担负对这些丰富的恩赐之物的使用之责(在新约中的 *oikonomos*——崇尚节俭之人! 路 12:45)他们接纳这些恩赐作为其财富,负有善用恩赐之责(勿使恩赐之物荒废),不能浪费恩赐之物而要经常以公益为嚆矢增益其价值。今天我们会谈及财富的社会责任。

在本文开篇所引证的对旧约“要为穷人留下田间剩余的果实”之诫命的阐释中,加尔文写道:“这是上帝给予人类的一种公民基本权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种权利——即便每一个人都可以毫无异议地称他的财富属于自己。任何一个拥有一块土地的人都可以收获土地所产谷物并以之养活他的家人。即便我们能以人间的方式说:‘那是我的’,我们也必须瞩望上帝,上帝将我们置于这种得天独厚的位置。全部的财富不应呆在我们手中。财富必须奉献——一方面是依照我们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应我们的邻舍所需。”<sup>⑰</sup>加尔文在这里以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阐明了商业伦理的三个原则:与财富相配的社会责任(与财富相关,而且同公平分配的责任联结);公平的负担配比(比如涉及财政能力的课税);以及适当的需求(谋求货品的流通和服务以消除贫困)。

加尔文关于信仰的教导,即上帝丰盛的赐福应该使所有的男人与

<sup>⑯</sup> Biéler, André, *Pensé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FN 11), p.355.

<sup>⑰</sup> Jehle, Frank, *Du darfst kein riesiges Maul sein* (FN 10), p.95.

女人得大利,这种信息引导他像路德和慈温利一样,得出何谓新教的工作伦理:靠自己的努力辛勤工作以赚得养生所需而非靠惟利是图或乞讨,而且与此同时纯粹地靠恩典生活,晓得救恩并非依赖善工。因如是之故,加尔文支持在日内瓦的禁止乞讨法令。加尔文的1561年教会法令因而宣布:“乞讨与任何美善的秩序背道而驰,禁止乞讨对教会理事会是必要的——我们已经饬令——派遣一些公务人员到教堂的出口以驱离那些想要乞讨的人。”<sup>⑱</sup>乞讨以及失业,有违人的尊严。州政府和教会负有避免失业的责任:“取缔任何人的工作都是蔑视他的生命。”<sup>⑲</sup>教会和政府社团应该创设针对贫乏者的机构。教会的圣徒相通和“福利社会”之雏形初现端倪。

自从2008年的危机以来,经济的生产力和发展多么依赖可预测和透明的政治——法律框架和社会网络系统再一次获得广泛认可。加尔文作为法理学家,不仅仅在新教教会圣职的发展上是先驱者,这种圣职伴随着清白高效的职司、服务以及责任(以及对今天的情况而言的一种太过粗糙的教会纪律)。加尔文与商业伦理相关的宪制性原则,举例来说就是权力机关和国民之间的相互制约(*mutua obligatio*),政府征税的权力,政府之保护贫弱者的职责和个人的深层次权利,居民之服从政府的责任(与特殊情形下的抵抗相结合)。政府也必须确保在贸易上公平、尊严的规则,这种规则防止“腐败”和“计量单位的弄虚作假”以及保证合约“凭诚实和信仰”的遵守。<sup>⑳</sup>

<sup>⑱</sup> Calvin, Johannes: *Gestalt und Ordnung der Kirche*. Calvin Studienausgabe Vol. 2, Neukirchen; Neukirchner Verlag, 1997, p.259.

<sup>⑲</sup> Calvin Sermon 137 on Deut 24,1-6, Op Calv. Vol. 28, p.162.

<sup>⑳</sup> Calvin's Commentary on Lev. 19,35, according to Biéler, André, *Pensé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FN 11), 384.

## 7. 科学和技术比之于上帝的荣耀

经济行为取决于文化和宗教价值、政治架构和科学——技术成就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加尔文表达了一种比其他的改教家更加激昂的态度,事实上表达了他对作为上帝的恩赐的科学和技术的“高度的赞美”。正如他在其巨著《基督教要义》中提出的:“如果上帝愿意藉着非信徒的劳力与服务,使我们得着物理、逻辑、数学,和其它文艺与科学的援助,我们就当接受;如果我们不好好利用上帝所赐的恩福,恐怕我们难逃因疏忽而应得的惩罚。”<sup>②7</sup>也许是提到了他的同时代人哥白尼的天文学研究(1543年的巨著),加尔文1559年写道:“至于星宿的位置,距离,及其特性的研究是需要专门的技巧、精确和勤奋的;上帝的眷顾既藉这些科学的发现而更为彰显,人心就应当更加提高来思念他的荣耀。”<sup>②8</sup>所以,像人类所有的活动一样,科学应该为赞美上帝服务——*Soli Deo Gloria*(荣耀独归上主)。加尔文在科学研究上的积极态度对带有加尔文主义印记的盎格鲁——萨克森世界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正如他对利息和资本的态度一样重要。

“利用大自然而不承认其创造者,是可耻的忘恩负义,”<sup>②9</sup>加尔文对自然科学可能的误用表示愤慨。当然生态学的问题没有像今天那样迫切地置诸其前,但借着断言上帝的神圣眷顾和恩惠环护整个的被造界,在被造界上帝“手中掌控所有造物”——正如他的日内瓦信纲所言,加尔文为商业的生态伦理奠定了基础。

<sup>②7</sup> Calvin, John, *Instruction i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stitutes)*, 1559/2007, II, 2,16.

<sup>②8</sup> Ibid., I, 5,2.

<sup>②9</sup> Calvin, Johannes, *Auslegung der Genesis*, ed. by D. Goeters and D. Simon, Neukirchen: Neukirchner Verlag, 1956, p.6.

## 8. 加尔文不同于加尔文主义和马克斯·韦伯的观念

世界范围内流行的那种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鼻祖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便是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这个论题归功于他,也没有宣称这种观点,他在一个世纪前仅仅研究了加尔文主义的特别样式而非加尔文本身。<sup>③0</sup>

在其“天职伦理和苦修的新教教义”的研究中,马克斯·韦伯评论道:“至于接下来的概况,也许要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在考虑加尔文本人的观点,而是在考虑加尔文主义,而且依照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在加尔文强有力影响的广大区域已经发展到了的那种方式的加尔文主义去考虑,同时,它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载体……当然,‘属于宗教改革的’决不等同于‘加尔文主义者的’”。<sup>③1</sup>

马克斯·韦伯特加描述的是一种苏格兰式的清教主义样式(本质上是Baxter式的),并且大体上几乎没有研究加尔文本人的观点,而实际上专门参阅了源自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手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韦

<sup>③0</sup> Stückelberger, Christoph, "Calvin, Calvinism, and Capitalism. The challenges of New Interest in Asia", in Edward Dommen/James D. Bratt (eds.): *John Calvin Rediscovered. The Impact of his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Studies, Princeton, 2007, pp.121-131. Stückelberger, christoph, "John Calvin und Calvin Klein. Reformierte Wirtschaftsethik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in Georg Pfleiderer and Alexander Heit (eds.), *Wirtschaft und Wertekultur(en). Zur Aktualität von Max Webers "Protestantischer Ethik"*, Zu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08, pp.241-58 (257). So Calvin was not the father of capitalism, as he has been seen worldwide through Max Weber's study o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sup>③1</sup> Weber, Max,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in id.,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I, Hamburg 1975, pp.27-278 (195).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1965.

伯在393个注释中只有一次引证过加尔文本人的著作。

此外，在加尔文时代资本主义尚未以其产业化的、现代的样式存在。必须加以区分的是：加尔文时代的商业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和今天的“ICT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主要是建基于资讯和交通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并因此而容许资本急速的、多变的流动。

Max Geiger, 我们神学院这位可敬的已故巴塞尔教会历史学家，在对加尔文、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础性研究中，作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没有关于加尔文(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渊源关系的议论”。<sup>②</sup> 历史的发展愈发复杂了。我的评论应该已经解释了加尔文和清教主义的不同。清教主义倡导为着上帝荣耀的辛勤劳作，加尔文的工作伦理着眼于能自食其力而不依赖他人，却能援助他人的人。然而清教主义实在是流于苦行，反对娱乐和性；对加尔文而言，享受乐事乃是对上帝恩赐怀感激之心运用的一种表达，只要这种享受行之以中庸之道。

让我们仔细聆听加尔文容许我们兼备：

对进步以及资源利用和发展的开放性结合以

对上帝恩赠的感激之心；

知晓上帝乃万有之主的谦卑与虚心；

对大能上帝一直支持我们的确信；

为着正义的勇气，其中包括为弱者介入的正义。加尔文因此曾是、现在也是与商业伦理密切相关的先驱；

对作帮工的男人和女子的待遇；

忠于正义和公益的银行业伦理；

使法律保障和个人自身责任相结合的政治架构；

并且所有的这些是为了对上帝的称颂。Soli Deo Gloria(荣耀独归上主)。

(译自 Christoph Stückelberger / Reinhold Bernhardt eds., *Calvin Global: How Faith Influences Societies*. Geneva: Globethics.net, 2009. 第二章。)

<sup>②</sup> Geiger, Max, "Calvin, Calvinismus, Kapitalismus", in *Gottesreich und Menschenreich. Ernst Staehelin zum 80. Geburtstag*, ed. Max Geiger, Basel and Stuttgart: Helbing und Lichtenhahn, 1969, pp.229-286 (286).